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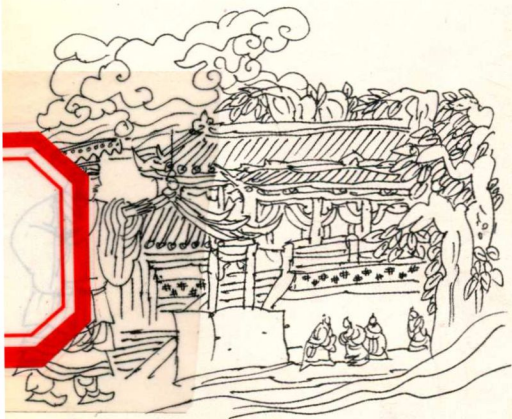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

总主编/李玉明

唐尧文化与 中国文明起源

薛新民
/ 著

为了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几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终于发现了陶寺遗址，首次确认了古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唐尧文化的存在，以确凿的资料证实，早在距今4500年以前，山西临汾盆地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复审:甘 弋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

终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尧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薛新民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2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188-3

I. 唐… II. 薛… III. 文化史—研究—山西省—古代
IV. 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952 号

唐尧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辑)

薛新民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02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套)

*

ISBN 7-203-04188-3
K·204 定价: 30.00 元(套)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申维辰	白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
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目 录

一、唐尧身分和唐尧文化	(1)
二、唐尧时期的年代	(3)
三、唐尧部族的活动地域	(7)
四、唐尧文化勃兴的历史背景	(10)
五、唐尧部族的崛起历程	(15)
六、唐尧部族的构成	(20)
七、唐尧时期的主要业绩	(24)
八、唐尧时期的礼乐制度和图腾崇拜 ...	(35)
九、文化中心的南移与禅让	(41)
十、唐尧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	(46)

引 子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令亿万炎黄子孙感到自豪，然而按照历史编年，只有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世界公认，至于二十五史之首《史记》开篇即列的“五帝”时代，长期以来，因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证据，被视为若存若幻的古史传说。人们不禁要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便言必称的“尧舜”，到底有无可靠的依据？中国古代文明的起点究竟在何时？

以田野考古为特色的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几代学者为探寻中华文明之源头，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发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从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确认了古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唐尧文化的存在，以确凿的资料证实素以表里山河著称于世的山西临汾盆地，早在距今四千五百年以前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此，我们谨将有关唐尧文化的基本知识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唐尧身分和唐尧文化

大抵自先秦开始，唐尧便被尊奉为已逝的“大同”世界颇有作为的一代圣主。但是对其人、其事的记述掺杂有

大量的神话成分，以至于他的身分也人神参半，真假难辨。因此，唐尧到底是古人心目中崇拜的天神，还是真实存在的人王？这是我们首先要辨析的一个问题。

在流传至今的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及诸子百家的作品均或多或少地记述了唐尧的事迹。这些记述自然不可能是著者亲见的事实。唐尧时期文字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将当时发生的大事记录下来的程度，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流传。后人用文字记录时，由于作者的观念和取舍的不同，出现了许多矛盾和歧异。于是：“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百不识一。”“礼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定儒墨之诚乎！”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后世对这些圣王的崇敬。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包括唐尧在内的“五帝三王”，一直被作为古代圣贤之君颂扬，视之为楷模。

20 世纪初，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以辨伪史料为突破口，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论证，认为在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春秋有尧舜，战国有黄帝、神农，秦时有三皇，汉以后有盘古。由此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看法，彻底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于是，基于传说的古史体系遭到彻底破坏，但是新的古史尚没有建立起来，商代以前的历史便成为一段长期的空白。从客观效果而言，“古史辨派”的辨伪工作为注重实证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重建中国上古史，从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时，便成为主要目标。1978年，山西发掘出襄汾陶寺遗址，该遗址发现的大片墓地及其墓葬中显示出的等级区分和特征鲜明的文化遗物，从一开始便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大成果后，对唐尧、虞舜部族文化的研究又渐次展开。于是在1998年临汾下靳再次发现与陶寺遗址早期墓地时代相若的大尧墓地时，学者们正式提出唐尧文化的学术课题，几千年来蒙在唐尧身上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揭开。

无论唐尧是真有其人还是春秋战国时才出现的名字，古籍中记载的他所在的地方却是真实的。由于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即使真有唐尧其人也只能找到其方国遗存，却不能保证发现与唐尧本人对应的遗迹与遗物；即使梳理出该部族文化的兴起和兴盛的大致年代，却无法确定所谓唐尧本人作为首领是在哪一阶段。因此，我们将唐尧视为方国部族的一个高级首领，并将他所在的部族兴盛发达，具有统领诸方国地位的阶段，称为唐尧时期。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唐尧文化、唐尧文明与传说中的唐尧既有联系又不能等同，但无论如何，由于陶寺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唐尧时期不再是若有若无的神话，而成为有案可稽的史实。

二、唐尧时期的年代

唐尧时期的年代学研究涉及到以下几个概念。

1. 传说时代

在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人类用口耳相传方法流传下来的一些史实在后世被整理记录下来，但这种记载与成文历史时期的史实无论从可靠程度，还是详细具体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掺杂着大量神话或被歪曲的部分内容。一般说来，有系统甲骨文记载以来的历史称为历史时代，此前则属传说时代；从这种划分上说，唐尧时期无疑仍属传说时代。

2. 史前时期

“史前”一词是清末从国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对史前史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所以，迄今关于史前史的具体范围仍无统一的标尺。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术语被曲解，直到 80 年代才又开始使用。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指出：“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这一观点被多数学者接受。以此来看，唐尧时期尚属史前时期，至少目前如此。

3. 中国文明起源时期

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但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区别野蛮与文明的主要标准又是什么？学术界的理解不同，于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也迟迟不能确定。如果夏代确已是十分成熟的国家形态，此前的尧舜时期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这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古史学家和考古学

家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这一点，正是唐尧文化倍受瞩目的关键所在。

4. 唐尧部族文化和唐尧时期文化

我们所说的唐尧时期，是指唐尧所在的方国部族首领担任中原诸方国联盟盟主的阶段。而唐尧部族的文化则还包括该部族首领未担任盟主之前和将盟主地位让给其他部族后这两个阶段在内。在此我们主要探讨唐尧时期，但有时也涉及到此前此后的一些内容。

唐尧时期的年代包括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两个方面。由于对唐尧之前的情况知之甚少，而尧之后由舜禹传到夏启线索却比较可信。因此，只能以相对明确的夏时期为基础来推算。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王朝始年定在龙山时代的后期，那么，尧舜二代应在龙山时代的早中期或其前身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之间作出选择。

唐尧时期的年代在先秦文献中记载十分简略，而且语焉不详。《史记·五帝本纪》认为，尧在位近百年，舜在位40余年，禹在位仅10余年，而《太平御览》卷82引《纪年》曰“禹位四十五年”，如此，尧舜禹时期共约150年或近200年。但是司马迁对此不敢确信，他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可知早在先秦时期，这些圣王的在位年数已经互相分歧，《史记》可采用的也只是一家之言。经统计关于夏王朝积年主要有七家十二说，或十五种说法，多数在四五百年范围之内，只有一个数据长达632年，比一般的估算

多出 156 年，而这个数据是依《晋书·束皙传》中“夏年多殷”一语推算出来的。对此，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唐兰认为：“可能由于《竹书纪年》是从黄帝开始的，也可以把尧舜年数都算是夏年，跟《尚书》把《尧典》、《舜典》都算《夏书》一样，所以，夏年多于殷。”若此，则尧舜禹时期的总年数大约在 150~200 年之间，与《史记》的记载接近。夏王朝始年既在公元前 21 世纪中叶，若除去舜禹二代的年代，唐尧时期的年代范围当在公元前 24 世纪到公元前 23 世纪之间。此外，据竺可桢先生介绍历代学者在研究《尚书·尧典》中有关“中星”位置时，均认为唐尧为公元前 2400 年前的人物。可见，文献中有关记载相差无几，大体上将唐尧时期的年代限定在公元前 2500 年到公元前 2250 年之间。

在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年代越早，跨年越长。距今 4000 余年前的遗存分期，目前只能将一期的积年定在一至二百年之间，而赖以确定绝对年代的碳 14 测年数据本身便有约百余年的浮动，再加上检测标本或其他条件的不同，同一时期的数据之间，又有相当大的差距。因而要在考古学文化序列中截取年代跨度并不大的唐尧时期有很大的难度，至少要涉及前后二到三期遗存。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约从公元前 2800 年开始，到公元前 2300 年前后发展为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据此将唐尧时期的年代范围定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阶段，当大致不误。龙山时代的早中期，处于中原方国联盟的领袖地位的已是虞舜和大禹所在的部族，尧后裔统领的方国文化只是一个从属

于其他部族的方国文化。

三、唐尧部族的活动地域

关于唐尧部族的分布地域，从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典籍的记载并不一致，即使同一部史书或同一个人的注释也常发生矛盾，致使后世学者不知所从。下面我们将与唐尧部族有关的几个地名及其不同的注解作一些分析，择其合理者与当地同时期考古学文化验证，从而确定该部族的活动区域及其中心所在。

唐尧亦称陶唐氏，其中陶和唐均为地名，我们先从陶和唐二地谈起。

关于“陶”的地望，《说文》认为：“在济阴。……《夏书》曰‘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也。今陶在山东曹州府定陶县西南。”因此有人认为尧居山东定陶。

“唐”的地望，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据统计共有七说，仅有一说在河北唐县，其余皆在山西，如翼城说、平阳（今临汾）说、永安（今霍县）说、安邑（今夏县）说、晋阳（今太原）说等。这些地名中，晋阳其实以晋水而得名，“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由此可推知晋阳实为平阳，在今临汾以西，太原称晋阳乃是后来的事。依此则唐的地望南不过夏县，西临黄河，北不越霍山，东不出翼城，比临汾盆地的范围略大一些。

文献中与唐尧族聚居区相关的地名还有冀州、大夏、夏虚等。

冀州，《尔雅·释地》指出：“两河间曰冀州”，孔颖达《禹贡·正义》亦认为：“明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其中的东河是指古黄河，在今河北偏西部北上，至天津入海；西河在陕西与山西之间；南河在今潼关以东的晋豫之间。此冀州的范围远大于前述唐地，不过据《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两河间为冀州，晋也。”则冀州主要为晋国所占据，而晋国始封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即使后来拓疆扩地，但在春秋中期以前一直未过霍县以北，因此在唐尧时期，冀州也当在晋南一带，最初可能是一方国名称，后来冀州因此而得名。

大夏与夏虚是有联系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后帝“迁实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周初叔虞封唐时，周王“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以上所述大夏、夏虚实际是同一地域的不同说法。大和夏实为同义语，《方言》“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而爱伟之，谓之夏”。可见大夏乃人们对自己居所的爱称。大夏的所在，历代注解与前述唐地接近，有说指平阳、晋阳、大阳（今平陆）、鄂地（今乡宁）的，也有泛指汾浍之间、汾绛的，还有翼城、平阳、安邑等不同说法，大致范围也在今晋南一带。

根据以上对唐尧居地的文献记载，大部分学者相信尧居晋南，甲骨文中，作为地名的唐不下10余条，而周初叔虞所封之唐在晋南，则唐尧在山西晋南最有说服力。至于

唐尧的居住地为什么会有山东和河北的说法,我们认为,可能是唐尧部族兴盛时期,曾接纳了这些地方的一些文化因素,后世对此的记述中将这种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误认为是主体的延续。

最终解决唐尧文化分布地还要取决于考古发现。如前所述,唐尧部族的兴起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后期,综观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分布在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类型及由此发展而来的陶寺文化,可与唐尧部族的分布地域吻合。

其实,陶寺文化遗存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晋南地区的专题调查中已有发现,只是当时尚未认识到它与周边同时遗存的差别。从开始发掘襄汾陶寺遗址起,才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该遗址包括有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遗存,具体年代约从公元前26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历时五六百年。以此为突破口,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仔细的田野考古勘察。截至80年代中期,在临汾盆地及周边区域,发现同类遗址70余处,尤以崇山(塔儿山)周围一带遗址最密集。80年代后期,发现洪洞侯村遗存与陶寺遗存既有相类特点,又有自身特征,从而丰富了这类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和研究内容。近年又发现一些新的地点,迄今已发现遗址百余处,并对曲沃东许、翼城南石、方城和临汾下靳等重点遗址进行了发掘。进一步确认,以临汾盆地为中心,在东到太岳山西麓、西临黄河、北近霍太山、南达峨眉岭的范围内,从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类型晚期到龙山时代陶寺文化,均属我国古代著名的唐尧部族文

化遗存。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类型，属唐尧时期，陶寺文化是虞舜、大禹时期的唐尧后裔文化遗存，其下限可能已进入夏王朝初期。

四、唐尧文化勃兴的历史背景

唐尧文化能够达到史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本地文化积累和广大地域文化汇聚共同促成的。

晋南地区是我国开展新石器时代考古最早的地区之一。1926年李济对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由我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对这一带的重点调查也有重大收获，但经过大规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却较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分析研究，确认从前仰韶的最后阶段开始到龙山时代，本地先后经过枣园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等几个大的阶段。在中原几次最主要的文化质变过程中，晋南及相邻地区都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是受益最多的地域。

约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中原地区主要分布着西部关中平原的老官台文化、东部伊洛郑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和东北部豫北冀南地区的磁山文化，这些地域文化虽已相当发达，但却相对独立，构成前仰韶时期三足鼎立的格局。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三支古文化开始向其相邻的晋南、豫西一带发展，相互之间的文化联系得以加强。位于这个文化因素汇聚中心的晋南地区，吸纳了三者的先进因素，在

本地前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前仰韶时期最发达的枣园文化，晋南地区成为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首次文化交流的纽带，兼容并蓄的思想理念和相似的经济生活使这支地域文化的发展充满勃勃生机。以此为源头，在陕、晋、豫交界地区，形成了仰韶时代最繁荣、最强大、影响也最广的庙底沟文化，这是中原地区不同文化碰撞产生的第一朵火花，黄河中游呈现出空前一致的文化面貌。对该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作了高度评价：“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文化因素以强有力的力度向外施加影响，以至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也受到中原风格的影响。

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晚期，在上述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基础上，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一批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其中最有影响的有辽西地区的红山诸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迥异，各有千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但是，包括晋南地区西王村文化在内的中原诸文化显得十分衰弱。在这种形势下，处于中原周边地区的文化开始向这里施加影响，文化之间的交流发生了逆转，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又一次先进文化因素的辐辏

和汇聚。

挺进中原的一支主要力量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约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后，大汶口文化在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下迅速勃兴，实力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促进了该集团向外拓展的速度，逐渐把地域扩展到豫东平原，这里成为它向西发展的桥头堡。一批带有清纯海洋气息的新因素，嫁接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原文化之中，诱发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在晋豫交界的黄河南北两岸同时起步。一直到公元前 2500 年前后晋南地区唐尧文化勃兴之时，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先进因素，仍循此路线源源西来。从这个角度讲，中原地区尧舜禹三部族的兴起，都与东方有关，这或许就是唐尧源于山东传说的由来。它虽不能作为唐尧起源山东的依据，但确实折射出部分古史的发展趋势。在唐尧文化复杂的文化因素来源中，大汶口文化是其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

对中原地区施加强烈影响的还有东北部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强盛是耐人寻味的一个奇迹，它根植于辽西文化区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之上，也许是那里沙质土壤易于开发的客观条件，促使其文化进步较快。在宗教意识方面的进步，是它突出的成就，主要代表是喀喇沁左盟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的大型石砌祭坛，辽宁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的女神庙、积石冢群等遗迹。与此相应的是制作精细、造型别致的玉器，这是我国史前时期第一道亮丽的文明曙光。但是该文化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丧失，文化中心被迫向南、

向西转移，这就给他们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公元前 3000 年前，这支部族辗转到了冀西北地区，与源于晋南一带的庙底沟文化相遇，两个不同传统的文化发生撞击，从而产生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群体。红山文化因素循当年庙底沟文化北进的路线南下，除物质文化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成为唐尧部族兴起的精神文化支柱，古文献中出现尧起源于河北的记载便源于此：“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真实地反映了红山文化因素由北向南的传播路线。

长江中游地区较成熟的农业文化，进入大溪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进入公元前 3000 年以后，在大溪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屈家岭文化乘虚向北大大幅度扩张，以致原来属中原文化区的南阳盆地一带基本被该文化同化，而且屈家岭文化北上的势头并未止于此，陕晋豫腹心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形成期，仍有该文化因子的大量渗透。屈家岭文化北上中原是长江流域文化首次较大规模地影响黄河中游，可视为后来楚文化参盟中原的预演。

更大范围间的交流发生在环太湖流域的东南方与中原之间。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古文化，尽管早已因河姆渡等遗存的发现著称于世，但其史前时期真正的高峰则是良诸文化的高度繁荣。良诸文化发展异常迅速，以大规模、规范化的遗址群，人工堆筑的大型祭坛和随葬有以琮为中心的成套玉礼器的大墓为其发达程度的物化标志。精湛的玉器制作技术和严格的宗教制度，与北方红山文化遥相呼应，